

论《静静的顿河》在现代观念上对《战争与和平》的突破

张中锋

(济南大学, 济南 250002)

摘要:《静静的顿河》在现代观念上对《战争与和平》形成了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表现在历史观上,历史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的”;表现在人性观上,人性是恶的而非善的;表现在人生观上,人生是悲观的而非乐观的。当然,这里的“突破”并不意味着《静静的顿河》的艺术价值更高,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二者在创作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也说明,《战争与和平》并非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静静的顿河》也不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现代观念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应该说《战争与和平》已经包含了大量的现代观念,比如历史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人性本恶以及人生的宿命论思想等,但这些观念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只是部分地得到了体现,作者终究没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现代意识的澎湃激情被抑制在古典理性的阈限内。而肖洛霍夫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他的现代观念在《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全面突破和充分体现。具体说来这种现代观念主要体现在历史观、人性观和人生观3个方面。当然,这种突破并不意味着《静静的顿河》其艺术价值更高,而仅仅表明二者在创作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历史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的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为时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是靠帝王将相推动,不是靠廉价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也不是靠善恶轮回或因果报应的主观良好愿望推动,更不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式的自然进化,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和神秘性。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为什么战争在此时此地进行而非别时他地?所有这些都是难于逆料的,那些所谓的军事天才和设计周密的作战计划,对于复杂多变的战争场面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愚蠢滑稽的。在奥斯特利茨的战役中,在两军紧张地对垒时,不知哪个士兵喊了声:“我们被包围了!”就引起了全军水泻般地大溃退。最后稳住部队阵脚的不是各级军官的嘶声喊叫,而是被忘了通知撤退的几个炮兵身上,他们那看似无效的持续放炮,却给敌对方造成步兵仍没撤退的假象,从而无意中避免了整个阵线的崩溃。战争是如此,生活也是充满了偶然性和难以逆料性。从娜塔莎对安德烈的初恋之热烈,很难想象她日后的背叛;皮埃尔的一生经历了结婚、决斗、被俘等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是在他意料之外的;尼古拉本来是信誓旦旦地爱着索尼亚,最终却和玛莉亚公爵小姐结了婚。所有这些个别的偶然行为,便构成了历史。

但是，正当托尔斯泰触摸到历史的神秘之处，人们也想期待着更多的新奇体验时，作者却令人遗憾地退却了。受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和西方理性哲学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仍然徘徊在理性的全知全能的范围内，即认为历史是可以认知的，历史是存在着规律的，因此，任何事情的发生看似是偶然的，实际上却被现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必然——所支配。在托尔斯泰看来，战争的胜负、家族的兴衰、时世的变迁以及爱情的发生等现象都被冥冥中的“自然法则”或“上帝”支配着，这种支配还要服从一个最终的目的，这就是要实现世界或宇宙的至善。并且实现至善的这个目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要服从这一目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反复申明，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托尔斯泰 1989：808）“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的，而且是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托尔斯泰 1989：809）“他们畏惧，虚荣，欢乐，愤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知道他们那样做都是为着自己，其实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托尔斯泰 1989：907）“假如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必须服从那个法则。”（托尔斯泰 1989：1756）

为了说明人类历史存在着“自然法则”，存在着通向至善这样一个铁的规律，托尔斯泰以他巨大的气魄，在《战争与和平》中设置了俄国抗击法国入侵的卫国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以四大家族的兴衰变迁及其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来表现历史是怎样通向至善的。战争是残酷可怕的，但是战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战争本身可能表现为不善，但战争的结果有可能导致善。正因为如此，所有参战人员的行为都只不过是盲目地充当着历史的工具。因此，即使率领几十万人的统帅也不再像以往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是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英雄。库图佐夫老态龙钟，由于精力不济，时常在军事会议上打瞌睡。至于怎样打败拿破仑，他并非胸有成竹，而是随遇而安。而拿破仑则充满着病态的蛮横和傲气，行为卑琐，性情乖张，他对俄国的大举入侵和从莫斯科的匆忙撤退，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因此，这些所谓的英雄比普通人也高明不了多少，拿破仑的被打败被流放和库图佐夫在战争结束后悄然死去，这都说明他们作为工具而被历史抛弃。可见战争本身的发生似乎也成了必要，是历史通向至善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这具体表现在托尔斯泰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上。《战争与和平》中的战争场面是异常惨烈和恐怖的。俄法两军在战场上相互撕杀所形成的死尸遍野的惨象，战地医院里锯腿断臂的惨叫声，以及莫斯科使千万人流离失所的熊熊大火，还有拿破仑撤退时几千人淹死在河里的景象，作者把这些都毫无同情心地表现出来。

战争除了给人世间造成巨大悲剧的消极作用外，在托尔斯泰看来，似乎还具有对人性进行洗礼的积极作用，战争能使人觉悟，能惩恶扬善。这具体表现在战争对四大家族的成员们的影响上。安德烈两度上战场，在临死前终于看到了世间名利的虚无，认识到了爱和宽恕的重要性；皮埃尔在当俘虏时遇到了农民普拉东诺夫，他使其彻悟了长期困扰着他的人生意义问题，最终皈依了上帝；尼古拉在军队转移中救助了处在困境中的玛利亚公爵小姐，并从她身上看到了世俗之爱和神圣之爱的差别；整日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库拉金家族则走向衰落，妖艳无比的海伦过早病逝，而她的哥哥阿纳托利则在战场上负伤死去。这里最幸运的要数罗斯托夫家族，尼古拉娶了最富有的安德烈的妹妹玛利亚公爵小姐，而娜塔莎则嫁给了俄国最富有的贵族皮埃尔。四大家族的结局之所以各有不同，这主要与每个家族以及每个人对“自然法则”或“自然至善”这一目的“领会”得多少有关。可见，小说中不管是战争结局的胜负，还是和平生活的变迁，都对历史发展“法则”的遵从与否相联系。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是有序的，都是

合乎理性的，正如玛利亚公爵小姐借《福音书》上的话所说的，“若是上帝不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托尔斯泰 1989：641）因此，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为了达到这种尽善尽美的目的，不惜借用很多巧合，并为这种巧合做了煞费苦心的铺垫和准备。

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体现的理性历史观不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展现的是非理性的历史观。非理性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盲目性。历史是一些并没有多少联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但是，在我们的许多教科书中和一些评论家看来，《静静的顿河》及其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却反映了历史规律，即反映了哥萨克人由“一战”到“二月革命”，再到“十月革命”，最终走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必然。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点，主要有这么三点原因：一是与我们长期受意识形态宣传影响有关，即认为葛利高里及其哥萨克人的悲剧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我们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也常常怀着矛盾态度：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感到庆幸。因为这场灾难使主人公和哥萨克人获得了觉醒，只是为了这个觉醒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些。这种司空见惯的矛盾观点其实是批评者受政治影响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从文本出发，就会发现作品本身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意图”。首先，主人公葛利高里历经磨难，精神非但没有觉醒，反到精神越来越萎靡，直至精神死亡。站在家门口的葛利高里抬头远望，所见到的太阳不是红的，而是黑的。至于葛利高里所拥抱的孩子，也很难让人想到希望，而是更多了份担忧。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是让葛利高里先后怀着三种理想（或信念）走向了战场。当葛利高里首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按照哥萨克的习俗为沙皇而战，但是这个理想不久就破灭了。首先是战争和杀人场面的残酷，使得生性善良的葛利高里感到困惑；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不久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逊位，葛利高里失去了作战的目的和动机。但随后他又为哥萨克人的自治而战，特别是红军将领惨杀哥萨克俘虏的场面，以及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所杀的结局，这更加激化了他的作战动力，他把原来对德国人的仇恨转向了对红军的仇恨，并由于他作战勇敢而当上了白军师长。但是，不久他便认识到，他不是在为哥萨克自治而战，而是为多少年一直奴役他们这个阶层的哥萨克、非哥萨克以及外国贵族老爷们而战，因此，战败后他拒绝登船到外国去。这时他只得选择参加红军，但由于红军的不断肃反，以及作为村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妹夫科舍沃依的敌对态度，和红军购粮队对哥萨克人的横征暴敛，迫使葛利高里又不得不参加了反红军的福明匪帮。当匪帮被剿灭，情人阿克西尼娅被打死在逃跑的路上之后，也可以说当葛利高里的生存借口或理想彻底灭绝之后，他只好回到家乡，等待悲剧的到来。就葛利高里自身的经历来看，也很难看出这种为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历史必然性来，他不过是当时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交织冲突的牺牲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静静的顿河》中并没有体现出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必然要被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所代替这一规律，我们看到的只是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一场为哥萨克人所遭遇的大灾难，是无数的谁也说不清是为什么的战争，毁灭了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殷实祥和的家庭，一个曾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哥萨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战争描写尽管很惨烈，但它的积极意义却是很大的，战争不仅能够促进一般人爱国主义热情的觉醒，而且还能使不少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得到升华。而《静静的顿河》中的战争却只具有消极意义，战争的连绵不断使人不但丧失了理性，而且无休止的相互报复残杀也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20 世纪意识形态泛滥成灾，而意识形态的独霸性、虚妄性和功利性，使这一系列为各种意识形态而发起的战争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性。更何况 20 世纪是以人为本的世纪，战争对于个人而讲只能是灾难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对于那种认为《静静的顿河》通过战争而让人寻找到真理的观点，葛利高里的悲剧结局只能是一种讽刺。有人认为葛利高里走了弯路，那正路又在哪里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正路？社会对个体的异化关系、对

立关系以及荒诞关系这一 20 世纪西方文学的主题，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不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了吗？那种认为历史可以认识的观点，以及认为终极真理已被发现的宣告，恰恰是人类进入 20 世纪遭遇到悲剧的最主要根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历史的态度上，肖洛霍夫对托尔斯泰形成了超越。

2 人性是恶的而非善的

认为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往往是划分一个作家是具有传统意识还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标志。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还不能正面对待自然，这时只能与自然为伍，也即还处在天人合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把自然看成是善的。既然把自然看成是善的，那么人性也必然是善的，这就是所谓的人人皆可成尧舜。（当然古人也有人提出人性是恶的，但同时也承认可以把恶改造为善，因此其实质上是和性善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到了近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这时人们不再把自然看作朋友，而是看作可以研究、索取的对象，于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由和谐变为对立和冲突，自然也就必然成为恶的。既然自然是恶的，因此人性也就成为恶的。这正如康德所说的，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自由的历史是从恶开始的。因此，对人性恶的认识，是对人性认识的深化，并且这一观点就构成了 20 世纪的一种现代意识。

处在俄国 19 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托尔斯泰，与其他传统作家相比，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托尔斯泰在一篇日记中谈道：“最常见的谬误是把人分为善良的、凶恶的、愚蠢的、聪明的。人是流动的，他身上有着各种可能性：曾经是愚蠢的，后来变聪明了；曾经是凶恶的，后来变善良了，或者相反。这便是人的伟大之处。因此不可指责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你指责他，而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你说了这话，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最好是写一部艺术作品来清楚地表现人的流动性，就是说，同一个人时而是恶人，时而是天使，时而是智者，时而是白痴，时而是大力士，时而是最软弱的人。”（托尔斯泰 2000：226—227）人性具有流动性、多变性的观点，或者说人性中既可能包含着善也可能包含恶的辩证观点，在《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皮埃尔为人正直，生性敦厚，他厌烦库拉金家族，厌烦海伦的轻浮放荡，但还是由于禁不住诱惑而和她结婚，尽管当天晚上就已后悔；安德烈第一次上战场因负伤而看穿功名，谁知几年后却再上战场，最终丧失了性命；尼古拉性情耿直，爱国爱家，但一次偶尔参与赌博，竟输掉了 4 万多卢布，这给早已经经济凋敝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为此他本人也一度想轻生；玛利亚公爵小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她看到父亲将死时，竟从内心萌发出了将要获得自由的快乐，尽管她自己害怕这种亵渎不敬的心理怂动，但却抑制不住；当然，最让人吃惊的还是娜塔莎，就这么一个单纯、热情、美丽的乡村贵族少女，竟然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夫，要和一个花花公子私奔，并不顾由此而导致自己和家庭的身败名裂。以上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托尔斯泰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这也是他笔下人物特别具有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由于托尔斯泰对人性是善的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因此，他对人物的复杂性，对人性自身恶的开掘仍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和歌德一样，认为恶的存在只是为了造善，人是有理性的，不管他受到多大的诱惑，人总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谬误走向真理，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综括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人性善的理性观点，使得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所犯的错误的都是暂时的，而并不影响他们走向人性的升华。皮埃尔、安德烈最终都在战争中顿悟了人生，皈依了宗教，把爱看作人生的真谛。尼古拉获得了爱情，振兴了家业。玛利亚、娜塔莎也都获得了爱情。特别是娜塔莎爱家庭、爱孩子、爱丈夫，不再注重穿着打扮，抛弃了虚荣心，成为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至于作品中人性恶的代表海伦和她的

哥哥阿纳托利，尽管大自然赋予他们美丽的外表，但是其人性的放荡堕落是一种恶的表现，是为作者所不能容忍的：海伦过早地病逝；而阿纳托利在战场上受伤死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历史观念，使作品反映人性复杂性的程度受到了限制。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坏人为什么一定要命短？好人为什么必定能获得幸福？人性为什么总能从堕落中复活？人的认识为什么总能从谬误走向真理，而不是相反？这里面是否包含着作者违背自然的主观臆断呢？或者像阿诺尔多所说的那样，作者只是坚持了肯定的辩证法，而忽视了否定的辩证法？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比较彻底的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人物都不再是理想的典型（典型恰恰是理想性格，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它认为人的本质是可以认识的），而是善恶本性并存的普通人，与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相比，他们的性格并不是很鲜明。葛利高里是善良的人，但也是一个生性残酷的人，只不过作者把他的残酷性格归于他身上鞑靼人的血统。葛利高里的作战勇敢和步步升迁是与他凶残地杀人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听说他的哥哥彼得罗被杀死后，他就把所俘获的俘虏全部杀死；葛利高里在情感上既爱着阿克西妮亚，却又和娜塔莉亚分不开，过着一种畸形的情感生活，给两位女性都造成了悲剧。葛利高里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都是因为或情欲或理性的软弱（犹豫）造成的，是人性恶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同情他是因为人性恶作为人的一种异化力量，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葛利高里结局的精神之死，恰恰说明恶的力量之强大。

阿克西妮亚是葛利高里的情人，她热烈地爱着葛利高里，但是由于禁不住情欲的诱惑，她竟委身于她的雇主小利斯特尼茨基，初次的懊悔并没有能阻止她一而再地赴约。如此处理这样一个爱情事件在整个 19 世纪的文学中几乎没有，因为爱情在启蒙时代已经被理性化、神圣化和理想化了，它岂能遭到丝毫的玷污。潘苔莱·麦列霍夫是一家之主，他总是谴责葛利高里情感的不忠和儿媳达丽亚的放荡，但是一次他在的草棚中遇见妩媚的达丽亚，却禁不住她的诱惑。达丽亚即使患上梅毒将要自杀时，也没有放过向娜塔莉亚透露了葛利高里私下与阿克西妮亚幽会的秘密，从而导致了娜塔莉亚因报复葛利高里而流产死亡，而这一切仅仅来自达丽亚对娜塔莉亚美满家庭的嫉妒。这是麦列霍夫家庭成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恶，至于社会上、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恶，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由于战争中的长期厮杀，使敌对双方的理性都降至到最低点，人的生命被极端贱视，有些人甚至为了一件衣服，一双靴子，就把对方杀死。战场上滥杀俘虏的场面时常发生，作品中描写最为残酷的杀戮场面是红军和哥萨克自治者们之间的杀俘虏竞赛。首先是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波乔尔科夫，把本应由他转送押运的 40 个哥萨克军官俘虏，擅自下令全部处死。在他首先用马刀把一个俘虏砍为两段之后，其他人也进入了砍杀行动，场面极其惨烈。“两个哥萨克砍死了那个身材高大、威武的大尉。他抓住刀刃，血从被割破的手巴掌上流到袖子里；他像小孩子一样喊叫着，跪到地上，然后仰面倒下去，脑袋在血地上乱滚着；他的脸上只能看见两只血红的眼睛和不断呼号的黑洞洞的嘴。尽管马刀在他的脸上和黑洞洞的嘴上乱砍不止，可是他由于恐惧和疼痛，还是一直在尖声喊叫。那个穿撕掉腰带军大衣的哥萨克，大劈开两腿，跨在他身上，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鬃头发的士官生差一点儿冲出包围圈——但是一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的一颗子弹打在一个中尉的肩胛骨中间，中尉正在飞奔，风吹起他的军大衣，像长了翅膀似的。中尉中弹后蹲下去，咽气以前，一直在用手指头抓自己的胸膛。一个白头发的上尉被就地砍死；在与生命诀别之际，他的两脚在雪地上刨出了一个深坑，而且如果不是有几个可怜他的哥萨克结束了他的性命，上尉还会像拴着的骏马一样，刨个不停。”（肖洛霍夫 2000：795）没过多久，波乔尔科夫所带领的红军就遭到报复，尽管他们是经过谈判自动交出武器的，但他本人连同 77 个士兵全被处死。其中一个在对德战争中曾荣获全部四个等级乔治

十字章的哥萨克，这个昔日的民族英雄，也被处死，尽管他跪在地上苦苦求饶。作者写到了当时的场景，“可憎的屠杀场面、正在死去的人们的惨叫和呻吟声、等待枪毙的人们的吼叫声，——所有这无比凄惨的、震惊人心的场面把人们驱散了。”（肖洛霍夫 2000：941）还有后来成了麦列霍夫家女婿和村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科舍沃依，也生性残忍，他不但一枪就把向他缴械求饶的彼得罗打死，而且还残忍地用手挤压彼得罗的正在流血的心脏，让鲜血尽可能多地流出来。后来也正是这个科舍沃依掌权后的疯狂报复，才使得葛利高里再度逃离鞑靼村，当上了土匪。我们由此也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竟然爱上这样一个恶魔。

在这场战争中，人性的恶已经得到充分的表现。人性变恶是否是由于战争之因？实际上战争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人性本恶，只不过战争更加凸显了这一点。说人性恶并不贬低人自身，而是让人们更好地正视人身上这个异己的存在，时时刻刻警惕它的膨胀，并努力用精神因素去同化它，驯服它。因为对恶的漠视往往就是对它的放纵。在对人性的挖掘深度和表现力度上，《静静的顿河》显然超越了《战争与和平》。

3 人生是悲观的而非乐观的

认为人生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是划分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的又一方法。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时常受着大自然的威胁，但这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认为自然是恶的，同时也不会认为人生是痛苦的、悲观的，因为这时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还没有觉醒。如果说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人从自然中摆脱出来，把自然当成对象来看待，那么个体意识的觉醒则让人从社会群体中摆脱出来。如果说主体意识觉醒后出于征服自然的需要，还必须借助人類群体的智慧，因而偏重于强调人的本质为理性的话，那么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社会群体所带来异化的警觉，因为个体在本质上是感性而非理性。作为传统社会的个体还生活在家族、国家等整体性的观念之中，还生活在天人合一之虚幻境地，还体验不到个体觉醒后承担责任的恐惧和痛苦，并且由于不能正视自然和研究自然，还看不到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回避生活中的任何矛盾，曲意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对象，因此，传统社会的人们认为生活是符合理性、可以认识的，因而人生是乐观的。既然如此，传统社会的作家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必然性，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去描写一种应然的生活，而非必然的生活。因而，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成了所有古典主义文学的共同特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论道：“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合实际，也许他可以这样反驳：‘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有的样子描写的。’”（亚里士多德 1984：93—94）传统社会的作家为了使复杂多变的生活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必然要编织理想的花环，依靠偶然和巧合，最终实现大团圆的乐观结局。而现代社会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因此，作为个体就已经不满足于像家族、国家等整体观念对个体的压抑和漠视，开始寻找自身的价值。当个体开始处在与自然、社会的对立地位时，一方面他能够满足权利实现的快乐，同时也会感到有一种前途莫测的恐惧感和个体生命易逝的悲剧感，因而这时个体眼中的现实生活将是悲观的。在 19 世纪西方哲学史上所发生的象征性事件，就是黑格尔理性哲学大厦的倾然倒塌和叔本华非理性哲学的建立。因此，对生活怀有悲观态度，是现代意识建立的标志。

处在近现代转折点上的托尔斯泰也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空虚感，他们虽置身优越的物质条件中却精神极度苦恼。皮埃尔这个俄罗斯的首富却时常伴随着空虚和由此带来的焦虑，在开始时他不得不靠满足肉欲来打发时日，但是此种方式不但未使他摆脱空虚，反而给他带来更大的烦恼，于是他又加入共济会，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直到他被俘时遇到一个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才明白人应该为上帝活着。安德烈是个生活在家族、国家等整体观念中的人，因此他的形象常常给人以崇

高之感。但是惨烈的战争打破了他的功名之心，使他看到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因此，安德烈精神最为低迷的时期，恰恰也是他个人意识最大程度觉醒的时期。娜塔莎更是如此，她虽然纯洁、单纯，但她不再是一个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贤淑之女，因此，娜塔莎的堕落也许是最让人难以理解和吃惊的，但正是娜塔莎的堕落包含着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安德烈是崇高的，但崇高的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阿纳托利的品质也许是可以质疑的，甚至是应该否定的，但在娜塔莎看来这种行为却是属人的，并且当索尼娅阻止她与阿纳托利私奔时，这个一向单纯的娜塔莎，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刚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的，奴隶！凡是 he 命令我的，我都照办。”（托尔斯泰 1989：769）空虚和孤独，以及竭力摆脱这种空虚和孤独，构成了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焦虑的原因。即使《战争与和平》以大团圆方式结尾，但仍然有一种不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不安情绪感染着读者。

由此可见，生活不但是空虚的，而且是可怕的。尽管托尔斯泰认识到了个体意识觉醒后人物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怪异”行为（其实这也是他笔下人物具有魅力之处），但理性的世界观和乐观的人生观使他对上述人物的行为，不能听之任之。在托尔斯泰看来，解决个体意识觉醒所带来的恐惧、孤独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个体意识的觉醒，重新再回到传统的宗法观念中去。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为消极的办法，因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取消问题本身。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托尔斯泰才会让皮埃尔这样一个具有自由倾向的贵族知识分子接受一个农民的上帝观；才会让曾经“执迷不悟”的安德烈死去；才会让娜塔莎这个最富有个性的贵族小姐，变成了皮埃尔的妻子——一个只知道生孩子和侍奉丈夫的平庸妇女。同时，为了把生活编织得更理想些，托尔斯泰不得不把繁杂的生活简单化，在这里巧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妖冶的海伦和风流的阿纳托利的突然死去，安德烈临死前与娜塔莎的相遇，皮埃尔的被俘与被救，所有这些都存在着极大的巧合。当然，最奇特的还是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利亚公爵小姐的相遇，为了让二者相爱，托尔斯泰不得不搬出英雄救美人的俗套。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战争与和平》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但我们说它仍没有脱出古典美学范畴。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却是一部充满了人生的悲观与绝望的作品。肖洛霍夫在该作品中，灭绝了任何可能透露出来的希望之光。作品以生活较为殷实的麦列霍夫家族为着眼点，来展示整个哥萨克人的悲剧命运。这个昔日充满欢声笑语的人家，到了作品的结尾却土崩瓦解了。葛利高里的情人阿克西妮亚，这个饱经生活磨难的不幸女人，却轻易地死在了与葛利高里出逃的路上。潘苔莱，这个一家之主，却患上了伤寒，客死在异乡。彼得罗在一场战斗中被打死，他那妖艳多情的妻子达丽亚，患病绝望后跳进了顿河。娜塔莉亚，这个历经情感折磨的女人，也因流产而死去。葛利高里的老母亲伊莉妮奇娜，也在屡受生活的打击下，在对儿子的极度思念中默默死去。关于伊莉妮奇娜对儿子的思念，读之让人万分悲切，他把收到儿子的信当成了儿子本身，每天晚上都让阿克西妮亚给她读信，“时间已久，用化学铅笔写的字母渐渐模糊起来，很多字完全认不出来了，但是对阿克西妮亚来说，这并不困难：这封信她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早就背熟啦。就是到后来，那张薄薄的信纸已经变成了碎片，阿克西妮亚也能不打磕巴地把信背到最后一行。”（肖洛霍夫 2000：1799）如此思念儿子的伊莉妮奇娜，临终也没能见到儿子，这个当母亲的最小要求也没能实现，生活对于这位老人来说，真是太苛刻了。葛利高里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侥幸活了下来，但是活下来的只是躯壳，而精神早已死亡，“哀莫大于心死。”这是麦列霍夫家族生活的悲惨结局，那么在家族之外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呢？葛利高里所生活的鞑靼村，这个昔日富裕热闹的村庄，如今却变得死气沉沉。在这几年的战乱中，鞑靼村几乎每家都有死伤的人员，因而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少看到年轻人。即使偶尔有本村的年轻人从战场上侥幸回来，也会很快遭到军事委员会主席科舍沃伊的怀疑、审查或逮捕。在生活上鞑靼村的人们变得更加艰难了，“哥萨克们由于不得不忍受种

种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而大骂苏维埃政权。不久前在一个小杂货铺子的基础上建立的统一消费合作社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肥皂、糖、盐、煤油、火柴、烟丝和车轴油——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生活日用品全都没有……但是最使人难熬的是没有盐吃。”（肖洛霍夫 2000：1820—1821）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粮食征集队还是照样向人们征集粮食，人们稍有反抗，就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人们仍然生活在紧张和恐慌之中，并且这种局面丝毫也看不到会有所改善的希望。

对于家庭和社会局势这样的状况，肖洛霍夫无法给他笔下的人物以任何好的结局。如果我们从一种良好的愿望出发，我们就会责问肖洛霍夫，为什么不能让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为什么没有让葛利高里人格和思想在磨难中得到升华呢？为什么葛利高里在老母亲临终前没能赶回来呢？为什么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要嫁给一个丧失人性的仇人科舍沃伊呢？所有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肖洛霍夫都没能让它实现，也许这在托尔斯泰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却是生活本身常常呈现的境况。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偶然无序、杂乱无章的，乐观的生活观是理性的，是对生活的简单化；而悲观的生活观是非理性的，是对生活原状的认可，是对生活本身认识的深化。只有采取悲观的生活观，才能对生活的丰富性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重视人的生存质量，才能更好地抵制来自生活本身的各种不幸和打击。正如美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尤金·奥涅尔所说的，“悲剧能够在精神上激励他们，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生活。通过悲剧，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无谓操心。他们看到悲剧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高尚。……悲剧使他们在精神上对事物有深刻的感受，使他们从日常的琐碎欲求中解放出来。”（尤金·奥涅尔 1988：747—748）

以上从历史的非理性、人性的恶、生活的悲观性等 3 个方面来论述《静静的顿河》在现代观念上对《战争与和平》的突破。现代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只能从 3 个主要方面来阐述。应该说现代观念在《战争与和平》中已经存在并得到酝酿，但还没有冲破理性的看守，还处在含苞待放阶段，还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前夕，到了《静静的顿河》，现代观念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彻底的张扬，才迎来了鲜花盛开的灿烂绚丽和暴雨滂沱的淋漓酣畅，因此，与《战争与和平》相比，《静静的顿河》在现代观念上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当然，形成这种局面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作家个人自觉程度的原因，但这种差异并不能说明哪部作品更伟大，只是在对“突破性”的论述中，让我们看到《战争与和平》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静静的顿河》也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因此，对于它们在美学观念上的这种独特发掘，才是这篇论文的真正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 [1]列夫·托尔斯泰 1989 战争与和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列夫·托尔斯泰 2000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 1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3]马克思 19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4]马克思 19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5]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2000 肖洛霍夫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6]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2000 肖洛霍夫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7]亚里士多德 1984 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8]尤金·奥涅尔 1988 论悲剧[A]，外国当代戏剧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9]张志伟，欧阳谦 2000 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ilent Don* breaks through *War and Peace* in Terms of Modern Concepts**

ZHANG Zhong-feng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 China)

Abstract: *Silent Don* breaks through *War and Peace* in terms of modern concepts. The break-through is expressed in three aspects: history is irrational rather than rational; human nature is evil rather than good; view of life is pessimistic rather than optimistic. Certainly, the breaking-through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higher in artistic value , but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The differences indicate that *War and Peace* is not a critical work against realism; nor is *Silence Don* a classic for socialistic realism.

Key words: *Silent Don*; *War and Peace*; modern concept

收稿日期: 2004-05-08

作者简介: 张中锋（1964—），男，山东夏津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

[责任编辑: 刘 锟]